

碳中和背景下气候政治的极化与政策偏好

——基于对欧洲政党的考察*

王聪聪

内容提要: 由于政党在气候政策的颁布和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因而理解西方不同类型的政党对气候议题的政治回应和政策偏好日益重要。本文聚焦政党与气候政策的关系,并以欧洲政党为例,阐释政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政策取向和立场,从而通过分析气候政策中的政党因素来理解西方政党竞争逻辑。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在欧洲地区的政治化程度及民众关注度不断提升,不同政党家族在气候政治议题上的极化和分歧越发显现。与右翼政党相比,左翼政党通常更重视气候变化议题,致力于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和能源转型,在碳减排措施的政策工具偏好方面更侧重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右翼政党则更加强调技术和市场在碳减排中的作用,希望碳减排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机遇,并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保障能源安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倾向于表达反环境主义和气候怀疑主义的政治立场。欧洲政党的气候政策偏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政党竞争、国情与自然资源禀赋、民意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气候变化 碳中和 气候政策 绿党 能源转型

2023年3月21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3》指出,人类通过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全球温升预计在2021—2040年内达到1.5°C。应对气候变化是21世纪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根据“净零追踪”(Net Zero Tracker)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球已有150个国家和150多个地区制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局与欧洲左翼政党新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3BKS19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定了碳中和目标。^① 气候变化是受到较多关注的环境政治议题,而气候政策也是环境政策中最复杂的政策领域之一。全球气候变化不仅具有不确定性,还具有跨代外部性和跨国外部性,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革命性变革和重构。^② 因此,与传统的环境政策相比,气候政策涵盖更为广阔的政策领域,它不仅涉及多个部门,还会对国家发展带来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③

关于气候变化和气候治理的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家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政治主体,政党政治的关注视角相对缺失。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治博弈,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党在气候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表明,更加强调环境政策、意识形态分歧较小的欧盟成员国政府在实现《京都议定书》和欧盟《责任分担协议》所设定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方面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就,而绿党参与组阁的联合政府也更加积极地推动碳减排。^④ 一些学者还指出,政党在气候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决定着政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施碳减排政策。此外,政党在塑造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⑤ 因而,把握不同政党对气候议题的政治回应和政策偏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各国的气候政策。与主流政党致力于减缓气候变化不同,欧美国家的众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经常表达反环境主义和气候怀疑主义的政治立场。西方国家政党在气候政治议题上的极化和分歧已日益显现。本文聚焦于政党与气候政策的关系,旨在探究不同政党家族的气候政治立场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分析气候政策中的政党因素来理解西方政党的竞争逻辑及其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

一 气候政策的议题竞争

在西方政治语境中,政党是否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是否将其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是

^① Net Zero Tracker, “Data Explorer,” <https://zerotracker.net/#data-explorer>.

^② 郇庆治主编:《大国担当的镜与鉴——应对气候变化与构建生态文明》,中国林业出版社2022年版,前言,第3页。

^③ Robert Ladrech and Conor Little, “Driv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Climate Policy Preferences: Lessons from Denmark and Irel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8, No.6, 2019, pp.1017-1038.

^④ Christian B. Jensen and Jae-Jae Spoon, “Testing the ‘Party Matters’ Thesis: Explaining Progress towards Kyoto Protocol Targets,” *Political Studies*, Vol.59, No.1, 2011, pp.99-115.

^⑤ Neil Carter et 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Climate Policy: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Parties’ Climate Policy Preferences,” *Party Politics*, Vol.24, No.6, 2018, pp.731-742; Fay M. Farstad, “What Explains Variation in Parties’ Climate Change Salience?” *Party Politics*, Vol.24, No.6, 2018, pp.698-707.

理解国家层面气候政治议程发展演变的重要维度。政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阻碍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的实施。在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传统经济社会议题通常会主导政治议程,但近些年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难民移民等“新”问题也逐渐成为政党议题竞争领域。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politization)通常指气候变化被纳入政治议程的过程,即气候变化具有选举相关性并成为政党竞争的主题。^①这一过程表明,气候变化议题在西方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越发显现。

根据政党竞争的显著性理论,诸如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反腐败等议题被视作“效价议题”(valence issue),即民众对此类议题的政策产出有着较为一致的期待和共识。^②面对效价议题,政党通常会避免在具体问题上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通过强调不同的政策重点或既往优势来争取选民。在环境议题上,主流政党最有可能制定适应性战略,采取支持环境保护的立场。气候政策虽然属于广义上的环境政策,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欧美国家,围绕是否退出煤炭、是否实施碳税以及是否支持《巴黎协定》等议题的政党分歧或立场对立日益明显。邓拉普(Riley E. Dunlap)等学者指出,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党派分歧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气候政策高度分裂。^③例如,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拜登上台后又重返《巴黎协定》。同样地,欧洲各国的左翼与右翼政党、左右翼阵营选民在气候政策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分歧。实证研究表明,左翼选民比右翼选民更加支持环境主义和碳减排措施,左翼政党则比右翼政党更倾向于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④因而,在法斯塔德(Fay M. Farstad)等学者看来,气候变化并非“效价议题”,而更多是“位置议题”(positional issue)。^⑤由于气候政策既涉及国家层面的气候立法框架、环境规制与低碳转型等宏观战略,又涉及市场层面的碳排放交易、碳税等具体措施,同时还与经济

^① Neil Carter, “Party Politic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Britain,” *Party Politics*, Vol.12, No.6, 2006, pp.747-767.

^② Ian Budge et al., *Mapping Policy Preferences: Estimates for Parties, Electors, and Governments 1945-19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Riley E. Dunlap, Aaron M. McCright and Jerrod H. Yarosh, “The Political Divide on Climate Change: Partisan Polarization Widens in the U.S.,”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58, No.5, 2016, pp.4-23.

^④ Eric Neumayer, “Are Left-wing Party Strength and Corporatism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Analysis of Air Pollution in OECD Countr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45, No.2, 2003, pp.203-220; Detlef Jahn, “Party Familie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 New Perspective on An Old Concept,”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Vol.15, No.4, 2022, pp.477-496.

^⑤ Fay M. Farstad. “What Explains Variation in Parties’ Climate Change Salience?” pp.698-707.

政策、能源政策、交通政策、农业政策等息息相关,因此,不同政治取向的政党在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以及碳减排的工具选择等方面极易产生分歧。此外,气候变化议题能否在国家层面受到广泛关注、能否成为政党竞争的显著性议题,也与政党的政治动员与策略选择密切相关。^①

二 党派理论视域下欧洲政党气候政策的共识与分歧

党派理论(partisan theory)是比较政治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它将左右分野作为分析起点,其基本假定是政党可依据其意识形态分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政党执政时也将根据其意识形态定位或政策偏好而实施相应政策。^② 基于党派理论,政党的意识形态将影响其在一系列政策议题上的立场,例如在经济政策方面,左翼政党通常支持经济扩张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右翼政党则更倾向于强调财政收支平衡。在气候政策议题上,欧洲主要政党在对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态度、减排措施以及能源政策方面是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本文着重回答的问题。

本文在综合国家实力、地域分布、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储备、有效政党数量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取了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六个欧洲国家作为分析对象。^③ 在数据资料方面,主要选取欧洲政党最近一次参加全国大选的“选举纲领”文本。选举纲领通常是指政党或总统候选人为在全国选举中赢得选票而发表的文件,它是研究政党政治和政党政府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之一。与党内其他政治文件、声明、领导人讲话等相比,西方政党的选举纲领最能够体现政党近期的政策取向和战略重点。在沃尔肯斯(Andrea Volkens)等学者看来,选举纲领可以被看作政党最重要的权威性政策声明,因而也是政党在特定时间内政策偏好的体现。^④ 西方政党选举纲领的出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精英和党员之间的激烈辩论和谈判,以及政策汇总、收集

^① Robert Ladrech and Conor Little, “Driv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Climate Policy Preferences: Lessons from Denmark and Ireland,” pp.1017–1038.

^② Douglas A. Hibbs,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4, pp.1467–1487; Detlef Jahn, “Party Familie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 New Perspective on An Old Concept,” pp.477–496.

^③ 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挪威最新的国内大选分别为2021年、2022年、2023年、2022年、2022年与2021年。

^④ Andrea Volkens et al., *The Manifesto Data Collection. Manifesto Project (MRG/CMP/MARPOR)*,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WZB), 2010, <http://manifesto-project.wzb.eu/>.

反馈等阶段,并且选举纲领也体现了政党的整体性意愿。^①因此,西方政党的选举纲领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其政策立场的重要参考。此外,本文也将综合考察部分政党近期出台的专门的气候纲领。通过对六个国家的社民党、保守党、激进左翼政党、绿党、自由党、激进右翼政党的碳中和目标和碳减排目标、能源政策的比较分析(见附表1—附表6),本文试图阐明政治意识形态是塑造政党气候立场的重要因素。

(一)主流政党在实现碳中和目标方面的政策共识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左翼的社民党还是中右翼的保守党,都更加关注气候变化议题。整体而言,除了部分国家的激进右翼政党之外,其他政党家族都普遍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于人类活动所致,气候变化和危机是当前最重要的时代挑战之一,并希望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一些绿党甚至指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②“气候紧急状况”(Climate Emergency)是一场需要所有国家积极应对的全球性危机。

左翼阵营的社民党、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都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例如,挪威工党提出,计划在2030年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减少55%,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③在2019年大选中,丹麦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丹麦应该再次成为一个绿色大国”的口号,并制定了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70%的宏伟目标。^④大部分绿党都在纲领中重申了欧洲绿党在疫情前提出的204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德国、法国、丹麦等国绿党均呼吁,到2030年本国温室气体排放应较1990年减少60%—70%。^⑤例如,德国绿党指出,德国2030年的气候目标应提高到至少减少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的70%,并希望在20年内实现气候中

^① Martin Dolezal et al., “The Life Cycle of Party Manifestos: The Austrian Cas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5, No.4, 2012, pp.869–895; Sondre Båtstrand, “Giving Content to New Politics: From Broad Hypothesis to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Norwegian Manifesto Data on Climate Change,” *Party Politics*, Vol.20, No.6, 2014, pp.930–939.

^② European Greens, “Priorities for 2019; What European Greens Fight For,” <https://europeangreens.eu/priorities-for-2019-what-european-greens-fight-for/>.

^③ Labour Party (Norway), “Arbeiderpartiets partiprogram: De store oppgavene løser vi best sammen,” <https://program.arbeiderpartiet.no/>.

^④ Social Democracy in Denmark (Denmark), “A Fair Direction for Denmark.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cialdemokratiet, Radikale Venstre, SF and Enhedslisten,” <https://www.socialdemokratiet.dk/media/wdrnd3wq/a-fair-direction-for-denmark.pdf>.

^⑤ Europe Ecology The Greens (France), “Vivant, Pour une République écologiste, Election Program of 2022 President,” <https://www.eelv.fr/files/2021/10/Projet-2022-11.07.21-NP-1.pdf>; Socialist People’s Party (Denmark), “AMBITION KLIMAPOLITIK,” <https://sf.dk/det-vil-vi/klimapolitik-og-groenenergi/>.

立。^① 德国、丹麦、挪威等国的激进左翼党也提出了较为激进的碳中和或碳减排目标,例如,德国左翼党提出了2035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到2030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比1990年至少减少80%。^②

右翼阵营内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保守党、自由党等也承认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的目标,以及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例如,德国基督教民主党指出,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既是基于保护自然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也是德国对《欧洲绿色新政》的贡献。法国共和前进党指出,为了使生态转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优先事项,法国是最早制定2050年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之一,并推动了“欧洲绿色协议”的出台。^③ 然而,右翼阵营内的大部分激进右翼政党都持气候怀疑主义的政治立场,很多政党主张退出《巴黎协定》。德国选择党、挪威进步党等明确反对将全球升温与人类活动相关联,认为气候变化是主流政党编织的一场政治骗局。

(二)“气候例外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的气候怀疑主义

与欧洲其他政党家族整体上致力于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相反,激进右翼政党家族气候政治的“例外主义”尤为明显,大部分政党都表现出较强的气候怀疑主义倾向。极右翼政党或激进右翼政党的政治认同通常建立在民族国家主义、威权主义、排外主义的基础之上。^④ 它们的纲领在诉诸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强调种族同质性的国家,且这些右翼政党的党员通常是民粹主义者。激进右翼政党倾向于使用“我们”和“他们”的两分法进行认同构建,突出群体内部和外部的差异,其往往通过对群体外部的界定来完成对群体内部的划分。^⑤ 激进右翼政党的外部群体通常包括国家内部的“精英”、其他民族,如移民,以及欧盟等,而它们对非欧洲籍移民尤为排斥,后者通常被看作对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的最大威胁。具体到环境议题,激进右翼政党可能基于民族利益而支持民族国家的自然遗产,但研究表明,与欧洲主流政党相比,激进右翼政党通常对气候变化持怀疑主义立场。例如,洛克伍德(Matthew Lockwood)指出,右翼民粹主义的

^① Alliance 90/The Greens (Germany), “Grünes Wahlprogramm zur Bundestagswahl 2021,” <https://www.gruene.de/artikel/wahlprogramm-zur-bundestagswahl-2021>.

^② The Left (Germany), “Zeit zu handeln: Für soziale Sicherheit, Frieden und Klimagerechtigkeit!” Wahlprogramm der Partei DIE LINKE zur Bundestagswahl 2021, <https://btw2021.die-linke.de/wahlprogramm-2021/>.

^③ The Republic Onwards (France), “Transition écologique,” <https://avecvous.fr/notre-action/transition-ecologique>.

^④ Jens Rydgren, “The Radical Right: An Introduction,” in Jens Rydgr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adical 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14.

^⑤ 杨云珍:《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49-50页。

兴起对气候议程构成了挑战,因为其领导人和支持者往往是气候怀疑论者,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持否定态度。^①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激进右翼政党的气候怀疑主义立场呈现出地域差异性,如奥地利、法国和荷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否认人类活动对气候升温的影响,而瑞典和芬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更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②

在本文考察的案例中,德国、挪威、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激进右翼政党普遍拒绝承认气候升温的科学证据,进而反对主流政党和政府的减排措施。例如,德国选择党指出,迄今为止尚未证明人类对气候变化负有重大责任,近期的全球变暖是在自然气候波动的范围内,气候不是人类假设的,自然也不能保证是可以被保护的。^③ 据此,德国选择党拒绝德国政府的2050年气候保护计划和脱碳措施,希望终止《巴黎协定》,废除所有形式的二氧化碳税,并就气候变化的原因和脱碳的破坏性后果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挪威进步党也认为,将洪水、气温异常、风暴等现象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可能是不合理的。^④ 西班牙呼声党呼吁暂停那些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所强加的、严重影响西班牙人利益和福祉的气候规则,希望放弃所有损害西班牙能源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协议(如《巴黎协定》),并倡议立即废除《气候变化与能源过渡法》,以便能够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勘探、开发现有自然资源 and 矿产。^⑤ 法国国民联盟虽然没有直接否认人类活动对气候升温的影响,但强调应打破被气候恐怖主义所扭曲的政治生态。在它看来,法国必须在保护全球生态中尽一份力,但应严格遵循有利于法国人的生态转型原则,以符合本国国情的速度逐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并退出“欧洲绿色协议”。^⑥

在一些学者看来,激进右翼政党家族的气候怀疑主义呈现出多样性,如“证据怀疑论”(evidence skepticism)、“过程怀疑论”(process skepticism)、“回应怀疑论”(response skepticism),即对人类对气候产生的影响、主流气候科学背后的政治决策过程,

① Matthew Lockwoo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Exploring the Linkag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7, No.4, 2018, pp.712-732.

② Stella Schalle and Alexander Carius, *Convenient Truths: Mapping Climate Agendas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Adelphi, 2019.

③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Germany), “Deutschland. Aber normal. Program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für die Wahl zum 20. Deutschen Bundestag,” <https://www.afd.de/wahlprogramm-klima-energie-technik-digitalisierung/>.

④ Progress Party (Norway), “Fremskrittspartiets partiprogram 2021-2025,” <https://www.frp.no/files/Partiprogram/2021-2025/Partiprogram-2021-2025-web.pdf>.

⑤ Vox (Spain), “UN Programapapa Lo Que Importa, Programa electoral para las Elecciones Generales del 23J de 2023,” <https://www.votaabascal.es/>.

⑥ National Rally (France), “L’ENVIRONNEMENT POUR UNE ÉCOLOGIE FRANÇAISE,” <https://rassemblementnational.fr/documents/projet/projet-lecologie.pdf>.

以及对气候议题的公共或私人回应提出质疑。^① 在本文的案例中,同样可以看到激进右翼政党家族内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举措和政治立场的多面性。例如,与其他激进右翼政党不同,丹麦人民党承认二氧化碳上升的部分原因是人为的,因此需要采取政治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秉承着对共同的未来负责任的态度,丹麦人民党强调,始终积极参与能源转型,希望在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但它对《巴黎协定》持批评态度,认为该协议缺乏公平,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责任存在差异。^② 总体而言,丹麦人民党支持丹麦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以及能源转型,并强调丹麦必须成为解决气候问题和绿色转型的先驱。

(三)左右翼政党的气候政策差异

虽然碳中和已成为大部分政党追求的政策目标,但在碳减排的力度与时间表、实现碳中和的具体方案、气候政策的工具选择,以及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视程度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党派差异。整体而言,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的碳中和目标更加激进,在选举竞争和执政过程中更加重视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政治议题。在减排措施的政策工具偏好方面,左翼政党更侧重国家的作用,而右翼政党则更强调运用市场机制。

欧洲左翼政党一方面强调需要通过国家气候立法、绿色投资、绿色税收等手段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也强调需要借由市场、技术创新等手段促进绿色转型,但整体上更倾向于前者。例如,法国的欧洲生态绿党认为,税收是一个强大的杠杆,可以成为社会正义和气候正义的主要工具,该党希望促进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正的发展,并建议欧洲央行保障专门用于生态转型的资金。^③ “不屈的法兰西”也强调要通过规划来改变当前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将绿色规则写入宪法,制定应对气候挑战的国家低碳战略,评估每项法律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生态和社会相关性,并重新思考财富分配方式。^④ 德国的联盟90/绿党指出,要通过法律监管、政策激励、资金支持以及为碳排放定价等措施的巧妙结合,确保气候保护的社会公正性和经济高效性。而能源转型的成功也依赖于为碳中和能源系统市场所设定的框架条件。^⑤

^① Willem Van Rensburg, “Climate Change Scepticism: A Conceptual Re-evaluation,” *SAGE Open*, Vol.5, No. 2, 2015, pp.1-13.

^② Danish People's Party (Denmark), “Danmark skal være et foregangsland på klima,” <https://danskfolkeparti.dk/politik/et-groennere-danmark/>.

^③ Europe Ecology The Greens (France), “Vivant, Pour une République écologiste, Election Program of 2022 President,” <https://www.eelv.fr/files/2021/10/Projet-2022-11.07.21-NP-1.pdf>.

^④ Indomitable France (France), “LA RÈGLE VERTE POUR ROMPRE AVEC LE PRODUCTIVISME,” https://melenchon2022.fr/wp-content/uploads/2022/03/Livret_UP_07_ECOLOGIE_web.pdf.

^⑤ Alliance 90/The Greens (Germany), “Grünes Wahlprogramm zur Bundestagswahl 2021”.

欧洲左翼政党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的公平性,希望雄心勃勃的绿色转型能够与福利社会建设齐头并进,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葡萄牙社会党指出,“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而确保公平和包容的转型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必要条件”。^①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也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公正转型的战略规划,希望为受到燃煤发电厂和核电站关闭所影响的地区制定紧急行动计划,促进绿色投资和进行必要的培训。^②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绿党也强调,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和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欧洲的地区冲突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思考如何部署可持续的、公正的转型,以实现气候中立。^③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谴责建制派政府或其他政党家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贸易与商业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并将气候变化的代价转嫁给民众,而公司从中获益。例如,德国左翼党指出,气候变化不仅涉及国内贫富差距与社会正义问题,还涉及全球正义问题。^④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也认为,世界各国对气候危机负有不同的责任,而挪威对气候危机负有历史责任,因此应帮助尽可能多的国家进行减排,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⑤

在气候政策的工具偏好方面,欧洲中右翼政党更倾向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案,注重创新和新技术在碳减排中的作用。保守党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回应与此前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与环境治理的新自由主义相一致,其气候政策立场具有路径依赖。^⑥ 例如,德国基民盟致力于实现生态和社会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气候中立,迈向商业繁荣和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未来。^⑦ 基于此,基民盟一方面主张利用市场工具实现欧

① Socialist Party (Portugal), “Programa Eleitoral Partido Socialista 2022,” <https://ps.pt/wp-content/uploads/2022/02/Programa-Eleitoral-PS2022.pdf>.

② 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pain), “COALICIÓN PROGRESISTA Un nuevo acuerdo para España. Government Agreement between PSOE & UNIDAS PODEMOS, 2019,” <https://www.psoe.es/>.

③ Initiative for Catalonia Greens (Spain), “Catalunya 2040; Ecosocialisme actiu per a la neutralitat climàtica 2022 November,” http://www.esquerraverda.cat/wp-content/uploads/2022/12/Catalunya-2040_-Ecosocialisme-actiu-per-a-la-neutralitat-climatica.pdf.

④ The Left (Germany), “Wahlprogramm der Partei DIE LINKE zur Bundestagswahl 2021. Beschlossen auf dem Bundesparteitag am 19. und 20. Juni 2021”.

⑤ Socialist Left Party (Norway), “SVs klimarapport,” <https://www.sv.no/politikken/hjertesaker/#hs1>.

⑥ Sondre Båtstrand, “More Than Marke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e Conservative Parties on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 Policy*, Vol.43, No.4, 2015, pp.538-561.

⑦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of Germany (Germany), “für ein Deutschland, in dem wir gut and gerne leben. Regierungsprogramm 2017-2021,” <http://www.cdu.de/>.

洲 2030 气候目标,加强德国《联邦排放交易法案》的证书交易,以及在能源、工业、航运等领域强化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大力实施氢战略,扩大德国在可持续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法国共和人党也强调,研究、创新和企业循环经济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捍卫基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支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① 丹麦保守人民党也明确指出,“气候行动的许多关键解决方案来自不断创新的丹麦商界”,“我们必须为实现绿色转型提供商业空间”,“让私人企业进行更多的绿色发电”。^② 在挪威右翼党看来,绿色转型取决于工商业的重组,因此,右翼党希望让市场为环境服务,使气候政策有利可图,并为经济增长和创造绿色就业做出贡献。^③

就欧洲自由党的选举纲领而言,气候变化并非它们重点关注的政治议题,但整体上自由党致力于实现碳中和目标,制定绿色自由主义议程,并希望将气候保护与市场经济、工商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相结合。例如,德国自民党认为,气候保护是当今时代最大的全球性挑战,因此希望尽快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这依赖于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气候友好型技术。^④ 基于此,自民党呼吁尽快将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扩大到所有部门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安全、科学地实现气候保护,同时通过全球统一的二氧化碳价格来确保公平竞争和“防止碳泄漏”。西班牙公民党也致力于实现气候环境保护与工业竞争力的结合,希望增加旨在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的研发投资。^⑤ 葡萄牙自由事业党也指出,实现环境可持续性是全社会所有人的责任,国家应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市场力量,特别是在能源转型领域不应通过过重的税负、过度的行政规制以及不适当的立法促进新能源的使用。^⑥

(四)左右翼政党的能源政策的差异

对于欧洲政党而言,能源政策是具有较大分歧的政治议题。虽然大部分政党支持

^① The Republicans (France), “NOTRE PROJET POUR LA FRANCE 2022,” <https://republicains.fr/wp-content/uploads/2023/01/2023-01-16-IR-notre-projet-pour-la-france.pdf>.

^②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 (Denmark), “NY ENERGI I DEN GRØNNE OMSTILLING, Adopted on October 2022,” <https://konservative.dk/klimaudspil/>.

^③ Right (Norway), “Høyre'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Manifesto 2021-2025,” <https://hoyre.no/politikk/parti-program/>.

^④ Free Democratic Party (Germany), “Nie Gab Es Mehr Zu Tun-Wahlprogramm der Freien Demokraten. Adopted on 14-16. May 2021,” <https://www.fdp.de/nie-gab-es-mehr-zu-tun>.

^⑤ Citizens-Party of the Citizenry (Spain), “Programa Marco, Elecciones autonómicas y municipales 28 de mayo de 2023,” <https://www.ciudadanos-es.org/por-los-tuyos-propuestas-2023-28m>.

^⑥ Liberal Initiative (Portugal), “Programa Eleitoral Legislativas 2022,” <https://iniciativoliberal.pt/legislativas-2022/programa-eleitoral/>.

从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但它们在能源目标、能源转型方案,以及发展何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整体而言,欧洲左翼政党普遍支持能源转型,致力于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一些政党甚至还提出“退煤”目标。例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提出,到2040年要实现85%—95%的可再生能源发电,2050年实现完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①德国社民党也提出,最迟到2040年实现完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2038年之前逐步淘汰煤炭发电。^②葡萄牙社会党同样致力于退出煤炭和实现经济提速的脱碳政策,希望在2030年左右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一倍以上,可再生能源服务于80%的电力生产,并占最终能源消费总量的47%。^③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也主张尽快实现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例如,丹麦“红绿”联盟党和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都提出,希望到2040年淘汰所有化石能源。^④在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看来,若要实现2030年气候目标和2040年能源转型目标,则需要制定公正、绿色的变革方案,提高能源效率,开发更多的可再生能源。^⑤

在左翼阵营内部,欧洲绿党的能源转型目标更加激进。在2019年的欧洲大选中,欧洲绿党呼吁到2030年逐步淘汰煤炭,并在此后淘汰其他化石燃料,以及立即停止对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补贴。^⑥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绿党都主张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其中,法国和德国的绿党都倡议退出核能,甚至退出煤炭。例如,德国联盟90/绿党指出,若要实现德国的气候目标,须在2030年停止燃煤发电,加快以太阳能、风能为支柱的可再生能源扩张步伐,并为气候中立的能源系统设定合适的市场框架。^⑦在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看来,丹麦必须在气候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该党呼吁本国到2025年从能源供应中去除煤炭,到2030年从固定装置中去除石

① 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pain), "COALICIÓN PROGRESISTA Un nuevo acuerdo para España. Government Agreement between PSOE & UNIDAS PODEMOS, 2019".

②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Germany), "The SPD's Programme for the Future. 2021," <https://www.spd.de/programm/zukunftsprogramm>.

③ Socialist Party (Portugal), "Programa Eleitoral Partido Socialista 2022," <https://ps.pt/wp-content/uploads/2022/02/Programa-Eleitoral-PS2022.pdf>.

④ Unity List-The Red-Greens (Denmark), "ENHEDSLISTENS KLIMAPLAN 2030: EN SOCIALT RETFÆRDIG VEJ TIL DET GRØNNE SAMFUND," https://enhedslisten.dk/wp-content/uploads/2019/02/Enhedslisten_Klimaplan_2030.pdf.

⑤ Socialist Left Party (Norway), "SVs klimarapport".

⑥ European Greens, "Priorities for 2019: What European Greens Fight For".

⑦ Alliance 90/The Greens (Germany), "Grünes Wahlprogramm zur Bundestagswahl 2021".

油,到2028年必须从天然气管网中去除天然气。^①

大部分中右翼政党赞成能源转型,但由于它们亲商业的立场,更倾向于对能源行业提供支持,希望降低能源税,提高能源效率,采用市场手段降低能源转型成本,大力发展碳捕获和碳储存、清洁氢气等气候友好型技术。例如,西班牙人民党主张取消发电税,最大限度地利用具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降低家庭和企业电价。^② 德国基民盟、自民党也主张降低气候保护的社会成本,大幅降低能源税。自民党指出,存储技术是实现碳中和能源经济的关键,希望废除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和电力税。^③ 此外,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保守党均强调要减少能源依赖、保障能源安全。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上述国家的保守党均希望本国政府尽一切可能,确保独立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例如,葡萄牙基督教保守民主和人民党指出,俄乌冲突加剧了能源价格上涨和能源战略的不确定性,因而必须通过减少国家对外能源依赖以确保能源安全,使葡萄牙能源和进口来源多样化。^④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丹麦和挪威存在自然资源、能源储备情况以及国情方面的差异,这两个国家保守党的能源政策立场的差别较大。丹麦保守人民党谴责丹麦可再生能源的扩张速度太慢,建议政府尽快制定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源效率的全面国家战略,为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提供强大动力。^⑤ 虽然挪威右翼党致力于实现绿色增长,但反对为挪威石油行业设定退出时间表,希望支持该行业寻找新资源和进行绿色转型。^⑥ 在右翼党看来,石油工业是挪威最大和最重要的工业,必须确保石油开采活动在环境、安全和应急等方面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确保挪威继续成为世界安全和环境领域的领导者。虽然德国基民盟和法国共和党都致力于使本国成为世界氢能领域的领导者,但二者在是否发展核能方面存在立场分歧,后者反对关闭核电站。不同于左翼政党,欧洲自由党普遍支持核能发展,希望建造新的、更现代化和更安全的核反应堆。西班牙公民党、丹麦自由联盟、法国共和国前进党等都希望将核能作为能源转

^① Socialist People's Party (Denmark), "AMBITIØS KLIMAPOLITIK," <https://sf.dk/det-vil-vi/klimapolitik-og-groenergi/>.

^② People's Party (Spain), "Por Todo Lo Que Nos Une, Program Electoral 2019," https://www.pp.es/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pp_programa_electoral_2019.pdf.

^③ Free Democratic Party (Germany), "Nie Gab Es Mehr Zu Tun-Wahlprogramm der Freien Demokraten. Adopted on 14.-16. May 2021".

^④ CDS-People's Party (Portugal), "TEMPO DE CONSTRUIR," <https://www.cds.pt/assets/tempo-de-construir.pdf>.

^⑤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 (Denmark), "NY ENERGI I DEN GRØNNE OMSTILLING, Adopted on October 2022".

^⑥ Right (Norway), "Høyre'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Manifesto 2021-2025".

型期间的备用能源。例如,丹麦自由联盟党指出,人类可以通过新技术来应对绿色转型,应该对核能作为清洁、稳定和绿色能源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增加对包括核能在内的绿色转型研究的资金投入。^①

与气候目标相一致,欧洲激进右翼政党整体上对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持否定态度,希望限制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强调能源安全与能源自主的重要性。例如,法国国民联盟与德国选择党都呼吁本国退出“欧洲绿色协议”,放弃不合理的碳减排和能源转型承诺。法国国民联盟反对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希望重新启动核能并投资氢行业,大幅降低能源产品的增值税,在能源转型中确保法国的生态安全。^② 德国选择党也反对风能、太阳能的大规模扩张,反对关闭核能和逐步淘汰煤电计划,主张将褐煤和硬煤发电、天然气发电作为可控的能源供应。^③ 丹麦人民党虽然支持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主张为风力发电设置上限,并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推出的二氧化碳公司税,希望通过新技术推动绿色转型。^④ 挪威进步党也主张继续发展本国具有优势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希望通过天然气出口帮助欧洲实现其气候目标。^⑤ 西班牙呼声党希望在继续发展传统化石能源的基础上,促进包括核能、光伏、风能、水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呼声党尤其强调能源主权的重要性,认为西班牙必须通过一切手段确保其能源主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外部能源的依赖,并呼吁推动一项国家能源主权计划。^⑥

三 欧洲政党气候政策的影响因素

相较而言,气候变化议题在欧洲地区拥有较高程度的政治化以及民众关注度,气候政策的冲突和分歧在政党政治领域也较为明显。欧洲政党在气候与能源议题上的偏好受到自身政治理念、自然资源禀赋、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党竞争、政治文化以及民意等因素的影响,而它们围绕气候政策的博弈同样会影响国家,甚至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

(一) 欧洲绿党在气候议题上的领导者角色

^① Liberal Alliance (Denmark), “Klimapolitik,” <https://www.liberalalliance.dk/politik/klima/>.

^② National Rally (France), “L’ENVIRONNEMENT POUR UNE ÉCOLOGIE FRANÇAISE”.

^③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Germany), “Deutschland. Aber normal. Program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für die Wahl zum 20. Deutschen Bundestag”.

^④ Danish People’s Party (Denmark), “Danmark skal være et foregangsland på klima”.

^⑤ Progress Party (Norway), “Fremskrittspartiets partiprogram 2021–2025”.

^⑥ Vox (Spain), “UN Programapapa Lo Que Importa, Programa electoral para las Elecciones Generales del 23J de 2023”.

作为“新政治”政党,绿党在成立初期的宗旨是成为超越传统左右分野的新型政党,它们以生态可持续为核心价值诉求,致力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党反对把经济增长放在政治议程的优先位置,并将自由主义与个人自治、民众参与,以及左翼对平等的关注联系起来。^① 生态学、基层民主、社会正义和非暴力曾是欧美绿党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当前,欧洲绿党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基本政治信条,将“环境责任、自由、社会正义、多样性、非暴力”作为核心的政治观和指导原则。^② 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环境运动、绿色非政府组织和绿党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塑造和影响绿色政治。它们旨在谋求传统政治结构和政策的“绿化”,促进绿色话语在公共领域的传播。与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相比,绿党的一个优势是它们可以通过选举竞争向选民提供一整套“绿色新政”方案,将绿色议题提上政治议程。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政党可以通过“议题创业”(issue entrepreneurship)战略来推动议题的演变和政治化,即提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政治议题或新议题,采取与主流政党不同的政策立场,并逐渐增加该议题的显著性。^③ 新型小政党或利基政党经常扮演“议题创业者”的角色,推动新政治议题进入政党竞争的舞台。欧洲绿党曾长期被视为生态环境和气候议题领域的“单一议题”政党。在从“反政党政党”“反体制政党”到体制内政党的转型进程中,从“超越左与右”到“新绿色”实用主义的战略再调整过程中,^④绿党充当了绿色议题“政治化”的代理人,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议题逐渐被纳入西方国家政治议程的框架内,得到了制度性和政治性回应。

依据政党的空间理论,政党通常会根据竞争者的政策变化而调整其政策。作为利基政党的重要代表,绿党“拥有”生态环境议题的所有权。该党在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一系列选举胜利和上台执政,不仅提高了生态环境议题的显著性,还加剧了与主流政党的战略性竞争。西方一些学者指出,利基政党的兴起重塑了西方多维政党竞争格局并影响了既存政党的行为,而作为战略行动者的利基政党也需要回应其他政党的议题竞争。^⑤ 至于主流政党是否关注利基政党的核心议题,则主要取决于利基政党

^① Herbert Kitschelt, “Left-Libertarian Parties: Explaining Innovation in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s,” *World Politics*, Vol.40, No.2, 1988, pp.194-234.

^② European Greens, “Charter of the European Greens,” <https://europeangreens.eu/charter-of-the-european-greens/>.

^③ Sara B. Hobolt and Catherine E. de Vries, “Issue Entrepreneurship and Multiparty Competi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8, No.9, 2015, pp.1159-1185.

^④ Ingolfur Blühdorn, “‘New Green’ Pragmatism in Germany—Green Politics beyo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Embrac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 No.4, 2004, pp.564-586.

^⑤ Bonnie M. Meguid, “Adaptation or Inflexibility? Niche Party Responsiveness to Policy Competition, with Evidence from Regionalist Par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62, No.2, 2023, pp.355-376.

的类型及其构成的选举威胁、将利基政党议题政治化带来的机遇,以及主流政党的最主要竞争者的策略等。^①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西方国家政党更有可能在回应竞争性政党,尤其是在相似意识形态的政策转变过程中进行政策调整,如左翼政党更有可能回应其他左翼政党的政策变化。^②因而,政治实力强大或选举表现较好的绿党会对左翼阵营的社民党、激进左翼政党带来更多的政策调整压力。

事实上,自20世纪60—70年代始,北欧地区的一些“新左翼”政党就已经对环境政治等“新政治”议题有所关注,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前期,西方国家的中左翼政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多。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在1990年的纲领中提出分阶段废除核能的目标,而环境保护也成为该党的核心目标之一。废除核能与推行生态税是德国绿党的核心政治诉求,由于早期德国社民党党内存在如何回应绿党挑战、处理与绿党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战略模糊,该党在1983年和1987年两次联邦大选中大量流失选票。自此,德国社民党开始对绿色政治进行战略回应,不仅制定了退出核能的政策,而且通过出台《柏林纲领》,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进行了“生态主义”改造。此外,基于联盟激励的考量,德国、瑞典、丹麦等国的社民党都将环境议题置于政党体系议程中最重要的位置。^③20世纪90年代,德国、瑞典社民党都通过与绿党结盟而赢得政府权力。

绿党是推动欧洲政坛其他政党“绿色转向”并关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议题的重要力量。“绿党的真正影响可能要从如下意义上来看,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迫使政坛中已经存在的‘灰色’政党和政治体制来主动回应绿党提出的选举威胁。”^④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虽然绿党、社民党和激进左翼政党都致力于碳减排和能源转型,但整体而言,绿党的气候目标与能源目标更加雄心勃勃。例如,在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方面,大部分社民党都将时间设定在2050年左右,而绿党普遍将时间设定在2040年;大部分社民党采用欧盟《欧洲气候法案》中承诺的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5%的目标,而

^① Bonnie M. Meg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 No.3, 2005, pp.347-359; Tarik Abou-chadi, “Niche Party Success and Mainstream Party Policy Shifts—How Green and Radical Right Parties Differ in Their Impac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6, No.2, 2016, pp.417-436.

^② James Adams and Zeynep Somer-Topcu, “Policy Adjustment by Parties in Response to Rival Parties’ Policy Shifts: Spatial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Twenty-Five Post-Wa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No.4, 2009, pp.825-846.

^③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The Reshaping of West European Party Politics: Agenda-Set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30.

^④ [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蔺雪春、郭晨星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绿党普遍将 2030 年的减碳目标设定为 60%—70%。欧洲绿党将气候紧急状态和气候危机视为当前人类和地球面临的关键挑战,致力于实现一个无化石能源的未来。在能源政策方面,欧洲绿党一致反对核能,希望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能源安全,为气候中立奠定基础。

除左翼政党外,在政党竞争和国际气候治理新形势下,右翼政党也可能调整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在德国政坛,除选择党外,其他政党在温室气体减排,履行《巴黎协定》《欧洲气候法》“欧洲绿色协议”等方面均有较强的政策共识,尤其是与左翼党、社民党的气候和能源转型目标以及绿党气候偏好更相近。德国的中右翼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曾是核能的坚定支持者,2010 年联盟党与自民党的“黑黄”政府决定将德国核电站的运行期限延长 12 年。^① 但 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之后,默克尔政府加快了淘汰核能进程,宣布 2022 年完全退出核能。近些年来,基民盟还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转型,在与社民党联合执政期间,第二届默克尔大联合政府(2013—2017 年)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案》,出台了《2050 年气候行动计划》等,第三届默克尔大联合政府(2017—2021 年)通过《气候保护计划 2030》。

(二) 政治意识形态是影响政党气候政策偏好的最主要因素

欧洲政党通常保持着独特的身份认同和连续性,其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议题的基本立场,并塑造着它们对新议题的回应策略以及政策调整方向。具体到气候变化领域,卡特(Neil Carter)和利特尔(Conor Little)等人都指出,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政策偏好都塑造和影响它们的气候政策。^② 不同政党在气候政策所涉及的诸多层面,如国家干预与规制、碳税、可再生能源补贴、碳排放交易、碳价、绿色技术等都有着不同的政策偏好。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欧洲政党在气候政策,尤其是能源政策取向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左翼政党更加致力于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希望在 2050 年之前完全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甚至淘汰所有的化石能源;中右翼政党基于能源战略自主性的考量,对可再生能源扩张持谨慎态度,希望降低能源税,其中激进右翼政党更侧重于继续使用化石能源与核能。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意识形态比其他政党特征更能解释不同政党在回应气候

^① 《德国宣布境内 17 座核电站运营期限将被延长 12 年》,凤凰网,2010 年 9 月 6 日, <https://news.ifeng.com/c/7fYvqN2aqCI>。

^② Neil Carter and Conor Little, “Party Competition on Climate Policy: The Roles of Interest Groups, Ideology and Challenger Parties in the UK and Ire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2, No.1, 2021, pp.16–32; Robert Ladrech and Conor Little, “Driv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Climate Policy Preferences: Lessons from Denmark and Ireland,” pp.1017–1038.

变化议题上的差异性。^① 本文基于欧洲政党的分析同样表明,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是否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是否支持能源转型,以及倾向于选择何种形式的绿色转型方案。从政党起源而言,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二者对财富分配以及市场与国家作用的不同看法。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国家选举竞争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主要是依据经济维度上的“左”与“右”而划分。^② 左翼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和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而右翼政党代表商业阶层,强调市场自由化。左翼政党通常倡导民主、社会平等与正义、团结与和平、集体主义等价值目标,致力于通过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或关键经济部门的国家控制来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捍卫工人阶级权利、增加社会福利。而“社会平等”无疑是左翼政党最核心的价值理念,^③欧洲社民党、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都将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视为最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一方面,左翼政党致力于福利国家建设,希望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另一方面,基于社会平等价值观,以及对中下层民众利益的关注,左翼政党更重视社会经济绿色转型中的公平性。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碳方案意味着对国家的经济体系、能源和交通体系,以及人们日常消费方式的重构,需要国家在立法、税收、市场等方面进行干预与规制,尤其是助力可再生能源发展,因而与左翼政党强调国家在气候与环境治理的作用、关键性能源部门的公共所有等价值理念更契合。与此同时,环境议题和气候议题是欧洲绿党的核心议题,左翼阵营的社民党、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在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右翼政党通常反对国家干预和国家功能的过度扩张,在文化层面相对保守,在经济层面强调市场机制和商业利益。具体到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右翼政党更倾向于以市场机制来替代直接的政府补贴。基督教民主党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保守党,其纲领受到天主教会学说,以及保守的新教、自由主义等观点的影响。基督教民主党一方面强调保护环境是基于上帝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与工业、商业集团、大资本家的密切关系,其亲商业特征使得它们在环境领域的立场相对保守。作为欧洲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政党家族,欧洲人民党以基督徒的形象为出发点,其核心的价值观包括生命每个阶段的尊严、自由和责任、平等和正义、真理、团结和辅助性原则。^④ 因而,一些学

^① Fay M. Farstad, “What Explains Variation in Parties’ Climate Change Salience?” pp.698-707.

^② [美]安妮·雷恩、[美]肯尼斯·M. 麦克尔韦恩:《选民与政党》,载[美]罗伯特·E. 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下),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2-554页。

^③ Norberto Bobbio,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Polity Press, 1996.

^④ European People’s Party, “Party Platform EPP Statutory Congress 17-18 October 2012 Bucharest, Romania,” https://www.epp.eu/files/uploads/2015/09/Platform2012_EN1.pdf.

者指出,保守党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强调市场竞争、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通常对环境主义持批判性立场。^① 在政治光谱中,自由党通常位于中间偏右的位置,自由主义是其经典价值观。它致力于追求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机会平等与民主,捍卫私有制经济,通常代表小企业主或中产阶级利益。欧洲自由党通常希望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重视创新和技术。在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领域,自由党的气候立场因国家而异,一些国家的自由党对“新政治”议题持包容态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自由党也是较早积极回应环境主义等“新政治”议题的政党,而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派别对是否回应新的政治诉求尤其重要。^② 自由党通常会依据自己既往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确定气候政治立场,譬如由于对市场和技术的推崇,多数自由党都主张发展更加现代化的核能技术、继续完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并大力发展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除技术,以及燃料存储技术等。在丹麦,当中左翼政府执政时,气候政策有较多的国家干预色彩,而 21 世纪初拉斯穆森(Anders F. Rasmussen)出任自由党与保守人民党联合政府首相时,中右翼政府优先考虑工业和农业利益,削减可再生能源支出,支持更多的市场解决方案。^③ 近年来,欧洲自由党对欧盟层面的气候目标与能源转型目标拥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主张在市场中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例如,在欧洲议会(2014—2019 年)关于欧盟 2030 年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框架的立法投票中,绿党党团和自由党党团对相关议案提供了最多的跨党派支持。^④ 但整体而言,保守党和自由党更青睐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希望大幅度降低能源税收和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并利用研究、创新、新技术将应对气候变化转化为经济增长机遇。

基于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捍卫以及对“精英”的不信任,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则普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持怀疑态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常基于两种原因反对主流气候政策,一是经济立场,即强调气候政策对“现代化失意者”或全球化导致的

^① Aaron M. McCright and Riley E. Dunlap, “Challenging Global Warming as a Social Problem: An Analysis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s Counter-Claims,” *Social Problems*, Vol.47, No.4, 2000, pp.499-522; Neil Carter, *The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Ideas, Activism, Polic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7.

^② Detlef Jahn, “Party Familie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 New Perspective on An Old Concept,” pp.477-496; Gordon Smith, “Between Left and Right: The Ambivalenc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in Emil J. Kirchner, ed., *Liberal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6-28.

^③ Robert Ladrech and Conor Little, “Driv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Climate Policy Preferences: Lessons from Denmark and Ireland,” pp.1017-1038.

^④ Aron Buzogány and Stefan Četković, “Fractionalized but Ambitious? Voting on Energy and Climat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8, No.7, 2021, pp.1038-1056.

经济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群体的威胁；二是反精英主义和反世界主义，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世界精英的议程。^① 诸多激进右翼政党开始将气候变化作为新的政治议题，强调其反建制的立场，譬如德国选择党此前宣称，气候议题是它们继欧元和移民政策之后的第三个主要议题。一方面，德国选择党基于经济原因反对联邦政府的气候行动和“欧洲绿色协议”，强调从煤炭和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将会导致技术设施成本增加和民众生活成本上升，以唤起对民众经济威胁的认同；另一方面，选择党强调了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和气候议程的“反精英主义”，质疑主流气候科学的合法性，声称其代表“人民”免受能源转型成本伤害，在此过程中强化了反建制的强硬立场。^② 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激进右翼政党在是否支持化石能源、选择何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存在明显分歧。例如法国国民联盟和丹麦人民党希望停止风能或限制风能发展，而德国选择党则反对太阳能扩张。总而言之，西方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的气候政策立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政党家族的政党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传统回应气候变化议题。左翼政党通常基于社会正义和全球责任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迫切性，而右翼政党则基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原则强调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气候变化议题方面的立场相对保守。

(三) 民意与国情对政党气候政策立场的影响

对于很多以选票最大化为目标的西方政党而言，公众意见也是影响政党政策定位的重要因素。政党或政治家可能会根据选民的政策偏好而调整其选举承诺和政策纲领。追逐选票最大化的政党更容易选择“追捧战略”(riding the wave)，尽可能讨论被选民和媒体热议的政治议题，迎合选民的政策偏好，以显示政党对选民关切的积极回应。^③ 很多关于气候政策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民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度对政党气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2006—2010年，布莱尔和布朗的工党政府以《2008年气候变化法》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以期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目标。工党之所以进行激进的气候和能源政策调整，一方面是基于政党竞争，

^① Matthew Lockwoo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Exploring the Linkages," pp.712-732.

^② Michael T. Oswald, Meike Fromm and Elena Broda, "Strategic Clustering in Right-wing-populism? 'Green Policies' in Germany and France,"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Vol.15, No.2, 2021, pp.185-205; Lars E. Berker and Jan Pollex, "Friend or Foe? —Comparing Party Reactions to Fridays for Future in a Party System Polarised between AfD and Green Party,"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Vol.15, No.2, 2021, pp.165-183.

^③ John Sides, "The Origins of Campaign Agenda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3, 2006, pp.407-436; Lee Sigelman and Emmett H. Buell, "Avoidance or Engagement? Issue Convergence in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1960-200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8, No.4, 2004, pp.650-661.

另一方面是因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后,英国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布莱尔、布朗、卡梅伦等政治家将气候变化作为其“叙事身份”的一部分。^① 在拉德里克(Robert Ladrech)等学者看来,公众意见是影响主流政党塑造其气候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在2006—2008年丹麦和爱尔兰民众对气候变化予以高度关注的时期,主流政党如丹麦自由党和爱尔兰共和党均更加强调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此外,爱尔兰民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相对较低的关切也使得爱尔兰主要政党并不热衷于推动气候议题的政治化。^② 在拉丁美洲地区,虽然气候变化受到民众关注,但并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或最主要的社会关切,因而气候变化议题只是被“低强度”地融入主流政党和政策领域,并没有成为政党竞争和政策差别化的对象。^③

在2023年欧洲晴雨表关于气候变化的民调中,欧洲民众将“气候变化”视为第三个最为严重的世界性难题,排在“贫穷、饥饿与缺水”和“武装冲突”之后,有将近22%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严峻的世界性挑战。^④ 这一结果还显示出较强的地域特征,北欧和部分西欧国家的民众更倾向于将气候变化列为最严重的世界性问题,如瑞典(41%)、丹麦(35%)、荷兰(35%)和芬兰(25%)等,德国、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持此观点的民众比例分别是22%、17%、16%和11%。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议题的态度呈现出“东西”差别,与西欧地区相比,中东欧国家民众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的关注度相对较低。^⑤ 整体而言,北欧地区的民众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议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更高,因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党共识更高,相应的气候政策和环境政策也更加激进。以丹麦为例,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仅次于就业、社会保障、移民等议题,而丹麦的诸多政党如社会主义人民党、左翼自由党、“红绿”联盟党以及替代党等都宣称自己是“绿色”政党,甚至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也致力于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社民党,丹麦社会民主党的碳减排目标更加雄心勃勃,自由联盟党、“红绿”联盟也都认为丹麦必须在全球绿色转型中走在前列,为世界提出可以效仿的绿色解决方案。

^① Neil Carter and Michael Jacobs, “Explaining Radical Policy Change: 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Policy under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 2006–10,”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92, No.1, 2014, pp.125–141.

^② Robert Ladrech and Conor Little, “Driv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Climate Policy Preferences: Lessons from Denmark and Ireland,” pp.1017–1038.

^③ Daniel Ryan, “Politics and Climate Chang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limate Issues in Latin America,” *Ambiente & Sociedade*, Vol.20, No.3, 2017, pp.271–286.

^④ European Union, “Eurobarometer Climate Change,”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2954>.

^⑤ Aaron M. McCright, Riley E. Dunlap and Sandra T. Marquart-Pyatt, “Political Ideology and Views about Climat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5, No.2, 2016, pp.338–358.

公众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转型等绿色议题的广泛支持,是西方国家主流政党调整其政策纲领、采纳更加绿色化的政治话语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在一些学者看来,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期,民众更容易关注非经济议题或后物质主义议题,政坛中的既存政党会倾向于通过强调绿色议题而赢得潜在选票。^① 在2017年和2021年的德国联邦大选中,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主导性议题,这一方面造就了德国选择党和绿党的强势崛起,另一方面也迫使其他政党,如社民党和联盟党推动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2019年,关于“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环保抗议运动和“欧洲绿色协议”的报道主导了德国媒体,这使得民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度有所增加,绿党的民调支持率达到了25%。^② 在2020年北威州的选举中,出于对极端天气的担忧和对德国最后一个投入使用的煤电厂——达特恩4号燃煤电站的抵制,民众对气候与环境议题的关注度甚至超越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③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气候变化议题成为民众的普遍关切或成为主导各国公众辩论的议题之一,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党都会主动或积极回应民众诉求。由于各国政党竞争态势的不同,欧洲绿党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以及主流政党对“绿色”政策的采纳程度也因国家而异。^④

此外,国情因素,尤其是自然资源禀赋、能源储备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要政党的能源政策偏好。通常而言,对于化石能源丰富的国家,主流政党特别是右翼谱系的政党并不热衷于采取激进的气候和能源政策。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那些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资源储量充足的国家,保守党基于亲商业的立场通常不会挑战化石能源行业,而更倾向于提出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的技术改进或优化措施。^⑤ 本文涉及的几个国家,如挪威拥有较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西班牙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法国拥有丰富的核能发电,这些国家的保守党虽然整体上都支持温室气体减排,但在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普遍站在化石能源行业的立场上。例如,挪威右翼党主张促进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在减少大陆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支持石油行业提高环境与安全标准,实现与渔业等其他行业的共存。法国共和党倡议国家应减少

^① Jae-Jae Spoon, Sara B. Hobolt and Catherine E. de Vries, “Going Green: Explaining Issue Competition on the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53, No.2, 2014, pp.363-380.

^② Michael T. Oswald, Meike Fromm and Elena Broda, “Strategic Clustering in Right-wing-populism? ‘Green Policies’ in Germany and France,” pp.185-205.

^③ 张孝芳、李祉球:《阶级投票、宗教投票与德国两大“人民党”的选举表现——基于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的比较分析》,载《德国研究》,2021年第2期,第36-53页。

^④ Zack P. Grant and James Tilley, “Fertile Soil: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Success of Green Parti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42, No.3, 2019, pp.495-516.

^⑤ Sondre Båtstrand, “More Than Marke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e Conservative Parties on Climate Change,” pp.538-561.

能源依赖,停止对风能和太阳能的补贴,并建议持续大力发展核电,希望将核反应堆寿命延长至60年并建造第二代EPR。^① 由于葡萄牙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有限,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较高,因此该国是首批放弃煤炭的欧盟国家之一,燃煤电厂的关闭、能源和燃料价格的上涨等都对葡萄牙造成严峻挑战。基于此,葡萄牙基督教保守民主和人民党提出了以实现能源转型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希望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不间断地获得能源,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并大力发展绿色氢气,提高能源的储存能力。^② 丹麦同样是化石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20世纪70—8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该国较早启动了能源转型之路,出台国家能源行动方案,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2012年,丹麦议会通过了2050年实现零化石燃料社会的能源协议,2019年还通过了首部气候法案,制定了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70%的目标。^③ 因而,在丹麦政坛中,几乎所有政党都支持相对激进的气候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

(四) 欧洲政党对气候政策制定的影响

政党政策偏好是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譬如绿党参与组阁的政府更有可能积极落实温室气体减排、退出核能与推动能源转型。在克尼尔(Christoph Knill)等学者看来,主流政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环境议题,可能直接关系到它们执政时的政策,以及它们与绿党合作的意愿。^④ 这意味着,如果生态环境议题成为政党竞争的目标,愿意与绿党合作的主流政党更有可能颁布更多的环境政策。一项基于欧盟27个国家政府环境政策的比较研究指出,欧洲主流政党在选举纲领中对生态环境议题的承诺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会对国家环境政策的制定以及欧盟气候和环境政策的谈判产生长远影响,它们执政时在一定程度上将遵循对环境政策的承诺。^⑤ 在20世纪90年代,分阶段退出核能与生态税改革是各国绿党的重要政策目标。然而,由于各国政府中的绿党充当着相对次要的角色,绿党在关系到其核心身份认同的核能与生

^① The Republicans (France), “NOTRE PROJET POUR LA FRANCE 2022”.

^② CDS—People’s Party (Portugal), “TEMPO DE CONSTRUIR”.

^③ Social Democracy in Denmark (Denmark), “A Fair Direction for Denmark.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cialdemokratiet, Radikale Venstre, SF and Enhedslisten,” <https://www.socialdemokratiet.dk/media/wdrnd3wq/a-fair-direction-for-denmark.pdf>.

^④ Christoph Knill, Marc Debus and Stephan Heichel, “Do Partie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ised Policy Area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arties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Outputs in 18 OECD Countries, 1970–2000,”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9, No.3, 2010, pp.301–336.

^⑤ Justin Leinaweaver and Robert Thomson, “Greener Governments: Partisan Ideologies, Executive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5, No.4, 2016, pp.633–660.

态税政策领域的执政成就相对有限。^① 尽管如此,多国政府中的绿党依旧利用环境政策领域的创议权推动了一些环境政策的出台或阻止了某些政策的推行。例如,芬兰绿党在第二届利波宁政府中的重要立场是阻止新核电站的建设,并因此于2003年退出联合政府。在德国绿党的努力和推动下,红绿联盟政府(1998—2005年)做出了20年或30年内分阶段消除核能的决策,^②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还于2000年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主流政党的“绿色转向”或对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议题的重视,有利于积极的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近年来,多国在社民党执政期间都通过了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法案。例如,西班牙议会于2021年5月正式通过了首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法》和《国家能源和气候综合计划》,气候法案提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并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排放目标,这也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合政府的重要执政成果之一。在2017—2021年的默克尔大联合政府执政期间,社民党推动了《气候保护计划2030》法案的通过,联合政府还于2020年做出退出煤电的决定。丹麦社会民主党致力于为绿色转型引领一个新的、雄心勃勃的方向,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一个绿色福利社会的榜样。在2015—2019年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丹麦政府缔结了超过75项绿色协议,为绿色转型拨款1100多亿丹麦克朗,并通过了首部《气候法案》。^③

四 结论

正如美国两党基于自身利益而秉持差异化的气候政策,^④欧洲政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偏好也呈现出明显的党派差异。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议题是绿党的核心政治关切,欧洲绿党提出了比其他政党家族更为雄心勃勃的气候和能源转型目标,而这些目标也是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右翼政党反对主流政党在减缓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层面的“精英”共识。由于气候危机的严峻性以及民众对气候问题的高度关注,大部分欧洲政党已将气候议题纳入政

^① [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英]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欧洲执政绿党》,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② 同上。

^③ Social Democracy in Denmark (Denmark), “Klimalov og målsætninger,” <https://www.socialdemokratiet.dk/det-vil-vi/klima/>.

^④ 威凯:《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分析——基于政党竞争的视角》,载《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137—154页。

治纲领,但并非所有政党都将该议题作为最重要或显著性议题,且它们对气候议题的政治回应也受到政党核心身份认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尽管主流政党在实现碳中和目标方面具有政策共识,但它们在气候与能源政策选择方面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例如,主流政党在是否支持能源税、是否支持可再生能源补贴、是否发展核能、是否支持能源部门的国有化、是否支持风能或太阳能发展、更多利用国家还是市场解决气候难题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左右翼分歧。因而,不同于其他生态环境议题,气候变化议题更多的是“位置议题”。

欧洲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程度以及政党的气候政治立场,除受制于政党意识形态和既有政策偏好之外,还可能受到民意关注度、政治体制、国情与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各国政党竞争态势,尤其是绿党的政治实力存在差异,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禀赋的不同,同一政党家族的政党在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偏好方面也可能存在立场差别。例如,不同国家的激进右翼政党的气候怀疑主义呈现出多样性,一些政党在碳减排和能源转型方面立场相对模糊,另一些政党则支持特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党的气候与能源政策偏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显著性和重要性的认知也会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极端气候的发生或重大政治事件的爆发而改变或调整。

理解欧洲国家的气候政策,除基于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等视角外,政党在气候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尤其是在不同政党围绕气候变化的政治博弈方面。本文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成为欧洲政党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政党的气候政治立场很有可能影响它们执政时的政策选择。而随着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相应政党对欧盟气候治理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关注。本文更关注对欧洲不同政党家族在气候政治立场的共识与分歧的比较分析,因而难免对同一政党家族内部政党偏好的差异性、政党党魁如何影响政党政策定位,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政党气候政策变化的关照不足。此外,基于研究问题,本文未能涵盖所有类型的政党,如民族主义政党或中间党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气候政策的议题竞争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表现和影响,以及政党大小、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民族主义对政党的气候政策立场的影响等问题。

(作者简介:王聪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齐天骄)

附表 1 欧洲部分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气候政策立场(最近一次选举)

	气候升温的人类影响	能源转型立场	气候目标	能源目标	气候政策工具偏好
德国社民党 (SPD)	认可	支持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38 年前淘汰煤炭	政府+市场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PSOE)	认可	支持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50 年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发电	政府+市场
葡萄牙社会党 (PS)	认可	支持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放弃煤炭,2030 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 47%	政府+市场
挪威工党 (AP)	认可	支持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较 1990 年减少 55%	发展碳捕捉、海上风能、氢能等	政府+市场
丹麦社会民主党 (S)	认可	支持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较 1990 年减少 70%	2030 年将海上风能增加一倍	政府+市场

注:表格系作者基于政党最新选举纲领整理。

附表 2 欧洲部分国家保守党的气候政策立场(最近一次选举)

	气候升温的人类影响	能源转型立场	气候目标	能源目标	气候政策工具偏好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认可	支持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30 年的目标与 1990 年相比提高到至少 65%	降低能源税, 大力实施氢战略	市场+政府
法国共和党 (LR)	认可	支持	/	法国成为世界氢领域的领导者; 停止关闭核能	市场
西班牙人民党 (PP)	认可	支持	/	建立稳定的能源结构, 取消发电税	市场+政府

葡萄牙基督教保守民主和人民党 (CDS - PP)	认可	支持	/	能源来源多样化	市场+政府
挪威右翼党 (H)	认可	支持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50%	确保石油和天然气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政府
丹麦保守人民党 (KF)	支持	支持	2030 年减少 50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政府应该尽快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全面战略	市场

注:表格系作者基于政党最新选举纲领整理。

附表 3 欧洲部分国家绿党的气候政策立场(最近一次选举)

	气候升温的人类影响	能源转型立场	气候目标	能源目标	气候政策工具偏好
德国联盟 90/绿党 (GRÜNE)	认可	支持	2030 年温室气体减少 70%, 20 年内实现气候中和	大规模加快可再生能源扩张, 2030 年完成“退煤”	政府+市场
法国欧洲生态绿党 (EELV)	认可	支持	2030 年将温室气体减少 60%	退出核能, 投资可再生能源	政府+市场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绿党倡议 (ICV)	认可	支持	2040 年实现碳中和	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政府+市场
葡萄牙生态主义党“绿党” (PEV)	认可	支持	/	提高能源效率	政府
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 (SF)	认可	支持	2030 年将温室气体减少 70%, 2040 年实现碳中和	到 2025 年从能源供应中去除煤炭, 到 2030 年从固定装置中去除石油	政府+市场

注:表格系作者基于政党最新选举纲领整理。

附表 4 欧洲部分国家自由党的气候政策立场(最近一次选举)

	气候升温的人类影响	能源转型立场	气候目标	能源目标	气候政策工具偏好
德国自由党(FDP)	认可	支持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扩展到所有行业和地区	市场中发展可再生能源,大幅降低能源税	市场
法国共和前进党(LREM)	认可	支持	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2050 年实现碳中和	能源脱碳,发展可再生能源,建造新的、更现代化的核反应堆	市场+政府
西班牙公民党(Cs)	认可	支持	/	能源转型期间推动核能作为备用能源	/
葡萄牙自由事业党(IL)	认可	支持	/	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分散生产	市场+政府
丹麦自由联盟(LA)	认可	支持	2030 年实现 100% 的温室气体减排	发展可再生能源,支持核能	市场+政府

注:表格系作者基于政党最新选举纲领整理。

附表 5 欧洲部分国家激进左翼政党的气候政策立场(最近一次选举)

	气候升温的人类影响	能源转型立场	气候目标	能源目标	气候政策工具偏好
德国左翼党(Linke)	认可	支持	2035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30 年前退出煤炭;2035 年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	政府+市场
法国“不屈的法兰西”(FI)	认可	支持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20 年减少 65%	政府+市场
西班牙联合起来“我们能”(UP)	认可	支持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2050 年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发电	政府+市场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SV)	认可	支持	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70%	2040年取消所有的化石能源	政府+市场
丹麦“红绿”联盟(EL)	认可	支持	2040年实现碳中和	2040年淘汰所有的化石能源	政府+市场

注:表格系作者基于政党最新选举纲领整理。

附表6 欧洲部分国家激进右翼政党的气候政策立场(最近一次选举)

	气候升温的人类影响	能源转型立场	气候目标	能源目标	气候政策工具偏好
德国选择党(AfD)	反对	反对	拒绝德国政府的2050年气候保护计划和脱碳措施;终止《巴黎协定》	退出“欧洲绿色协议”,拒绝逐步淘汰煤电,限制可再生能源扩张,拒绝光伏建设	市场
法国国民联盟(LR)	支持	部分支持	法国按照自主选择的步骤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	退出“欧洲绿色协议”;能源产品的增值税从20%降至5.5%;停止风能,重振核能	市场
西班牙呼声党(VOX)	反对	部分支持	反对《巴黎协定》	确保国家能源主权,继续使用化石能源、核能,发展可再生能源	市场
挪威进步党(FRP)	反对	部分支持	制定可预测和具体化的气候政策	清洁电力生产,继续发展挪威的石油、天然气	市场
丹麦人民党(DF)	支持	部分支持	2050年实现碳中和,反对《巴黎协定》	取消电力税,为风力发电设置上限	市场

注:表格系作者基于政党最新选举纲领整理。